

多措并举完善高校人才评价机制

赵全军

之江智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的“指挥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高校既是各类人才的重要集聚地,也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必须不断完善高校人才评价机制,为国家和区域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撑。

高校是创新人才培养和集聚的重要高地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的科技、产业创新快速迭代升级,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人形机器人、类脑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6G 等未来产业蓬勃兴起,代表科技新方向、产业新趋势的新质生产力正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加速形成并展示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持力。

生产力的核心是“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鲜明提出“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的观点。而“人才”又是人力资源中具有较高素质和技能的那部分人,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跃升的最核心要素。由此不难发现,作为一种科技密集型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比传统生产力更加依赖高素质、创新型的劳动者,更需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意创造能力的发挥,更需要“以人为中心”来推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和更新升级,特别是要推动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并将其转化、迁移、传导至产业发展一线,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因此,人才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根基在人才、关键也在人才。

高校作为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结合部,既是人才的培养高地,也是人才的集聚高地,拥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重大人才。特别是高校庞大的师资队伍中集聚的大量科技创新人才,更是直接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以浙江为例,目前全省共有各类高校 109 所,

这些高校的高层次人才是产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依靠的核心力量。比如,在 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由浙江主持的 5 项获奖项目都是由省内高校牵头完成。因此,要培育发展区域新质生产力,必须把高校人才资源开发摆在突出位置,以高校人才队伍的结构优化、集聚度提升和效能发挥,加快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实现生产力的加速跃升。

高校人才评价机制存在的问题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列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加以强调以来,我国对人才评价机制进行了多轮改革创新,有力提升了高校人才评价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但从实践来看,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目标相比,当前高校人才评价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评价导向有偏差的问题。人才评价的方向不明、导向不正,人才创新创业的活力就难以得到充分激发和释放。当前,高校人才评价还存在着过于强调学历、职称、论文、项目、奖项、头衔等显性指标的现象,人才评价标准“一刀切”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这样的评价导向带来的负面效应显而易见:一方面,导致高校人才往往倾向于把精力主要用在发表论文、申报课题、获取奖项、争取经费、评审头衔上,而不愿投入到满足市场需求、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技术攻关、工艺流程优化等相关研究工作上来,容易造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两张皮”的问题,难以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提供实质性的创新动能。在调研中,一些行业主管部门、企业单位相关负责人反映,当前高校人才的科技创新工作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为了研究而研究”“闭门造车式研究”等现象。另一方面,导致从事应用研究、工程设计、成果转化的高校人才很难在评价体系中“对号入座”,这不仅会使高校人才创新积极性受到影响,还会导致人才评价结果和产业发展需求脱节,不利于更多优秀科研人才投身产业发展一线。在调研中,一些高校人才就反映,与高级别的“纵向项目”相比,承接与企业合作的“横向项目”积极性相对不高,因为与之有关的成果难以纳入职称评审、岗位评聘、人才称号评选等评价指标体系之中,做得

比较好也难以“出人头地”,无法享受人才政策红利。

二是评价方式不科学的问题。一方面,当前高校人才评价方式行政化的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比如,对人才能力水平的评价,主要是看有没有人才“头衔”,以及人才“头衔”究竟是哪个层次的,是国家级的、省级的还是厅局级的;对人才立项课题或所获奖项的评价,也主要看课题或奖项的“行政级别”,而对成果本身质量关注不够,级别越高就会被认定为质量越好,所获得的政策红利就会越多。另一方面,单位主体、社会组织和市场认可的多元评价机制还未形成,评用脱节问题也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比如,人才工程评价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存在“评人的不用人,用人的不参评”的问题,以至于人才评价失真和偏颇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高校人才评价对不同类型人才成长周期差异、团队化协同关注不够,重个体考核、轻团队效应,以及评价考核种类繁多、过于频繁的现象也较为突出。

完善高校人才评价机制举措

一是深化评价标准改革,构建分层次、分类别、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一,要以业务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实行差别化评价,针对基础研究人才、技术开发人才、科技服务人才分门别类制定精细化的评价标准,因地制宜采用考试、评审、考评结合、考核认定、个人述职、面试答辩、实践操作、业绩展示等不同评价手段,提高评价的针对性和精准性。第二,要以服务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导向,改变高校人才评价过于偏重论文、项目、奖项等显性指标的做法,将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创办领办企业、获得风险投资规模、对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等作为评价高校人才的重要标尺,注重通过市场反馈来衡量人才价值和潜力。第三,要合理界定和下放人才评价权限,对具备条件的高校进行人才评价充分授权,支持高校结合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以人才的专业水准、创新成果、实际贡献和行业影响力等为基准,制定个性化、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围绕职称评审、岗位评聘、人才工程评选等开展自主评价工作,促进人才评价与培养、使用、激励等相衔接。

二是深化评价方式改革,构建团队化、重长远、贯通式的评价方法体系。第一,要优化评价对象设置。要

由以单打独斗为主的“个体评价”转向以协同创新为特点的“团队评价”(如学科组、项目组评价等),既达到体系化、集成式推动解决重大科技问题、培育形成标志性成果的目的,也有效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跨学科交叉、跨领域协同的新趋势新特点。第二,要科学设置评价周期。要改变重眼前、轻长远的不良现象,由相对短期的“年度考核”转向相对长期的“聘期考核”,既适应不同类型人才成长发展规律,也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为各类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通过持续研究、长期积累,把科研成果产出和转化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等生产一线创造条件。第三,要推动人才评价一体贯通。要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要求,推动高校与科创平台、科技企业通过互派双聘、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人才使用贯通,高校人才以科创平台、科技企业名义取得的成果在派出单位评价考核、职称晋升、岗位聘用中应予以认可;要促进人才评价和项目评审、机构评估有机衔接,构建起在重大科研项目、重点科研平台、重大成果产出中评价识别人才的有效机制,加强评价结果共享,避免多头、频繁、重复评价人才。

三是深化评价保障改革,构建规范专业、强化运用、开放包容的评价生态系统。第一,要加强评价专家队伍建设,优化人才评价专业力量保障。要根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优化评价专家来源和结构,增加工程技术专家、投资专家等实务专家的比例;加强评价专家数据库和资源共享,建立随机、回避、轮换的专家遴选机制,以及评价专家责任和信誉制度,提升人才评价专家的专业水准和公信力。第二,要强化评价结果的运用,充分发挥人才评价的杠杆效应。要强化“能者上、优者奖”的激励机制,把评价结果作为高校关键资源配置(如职称指标、学科建设经费等)的重要依据,让评价结果既成为激发人才创新创业的动力源泉,也成为助力人才补足短板的有效途径。第三,要加强评价法治和文化建设,构建良好的评价软环境。要严格规范评价程序,建立健全申报、审核、公示、反馈、申诉、巡查、举报、回溯等制度,为提高评价质量、维护人才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要提倡开展平等包容的学术批评、学术争论,保障不同评价观点的充分讨论,营造追求真实、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评价氛围和环境。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知名专家说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南通大学长三角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文汇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发展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学就是要把人文精神融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推动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使经济社会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为什么要提出人文经济学?我认为这是由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加快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迅速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状况,“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进入21世纪,中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推进发展,扩大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也接踵而至。早在1993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还困难”。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在经济社会诸多层面日益凸显出来:

首先是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具体来说,经济发展要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创新。另外,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低成本劳动力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亟待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小康社会已经全面建成,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不只局限在物质层面,民主、法治、公平、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然而,现实依然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生态环境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其中,既有许多中长期的困难和问题,也有不少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再次是发展环境的错综复杂。发展起来以后,我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也日益复杂多变,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风险挑战。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以及生态环境风险,还有国际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风险等。值得注意的是,各方面风险和挑战如果不断累积发展,很有可能会产生联动效应,进而对我国稳定发展形成更大的威胁。如果缺乏应对重大风险爆发的准备,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就可能迟滞。

最后是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更是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应该肯定,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普遍从发展中获益很多,但两极分化的风险依然存在,共同富裕成为本来就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的人民群众的期盼。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如何解决?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人文的思考,拓宽改革发展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人文经济学关系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何建华

(本报记者 张竞聪 整理)

以中观架构为指引加快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

陈溪

专家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考察浙江时,明确提出浙江“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为做好开放领域各项工作总牵引,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定不移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塑造对外开放新优势、释放开放合作新红利。

高水平高能级开放的着力点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要围绕“提升资源配置力、全球辐射力、制度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做到“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增强“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等战略目标来推进各项工作,最终成效也要以此来检验。

为指引相关工作,浙江提出坚持“两手抓”、突出“三件大事”和注重“五个统筹”。“两手抓”指一手抓硬件,就是要抓好港口、机场、集疏运体系等建设;一手抓软件,就是不断创新提升规则、制度、服务等水平。“三件大事”就是“平台提能级、枢纽建强、模式创新”;“平台提能级”指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义乌小商品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还有各类展会等,都要提高能级、创新规则、完善制度;“枢纽建强”指世界一流强港、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民航强省3个方面都要做大做强;“模式创新”指外贸外资要创造新模式,“五个统筹”,即统筹改革和开放、统筹“硬件”和“软件”、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内贸和外贸、统筹开放和安全。这些主要抓手和工作导向的部署实现了对战略目标的系统

性分解,为各层级地方政府、各领域职能部门或各行业大型国企的实践行动提供了宏观指引。但是,如果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全面、系统且可操作的中观指南,可能导致宏观层面的战略目标与各行各业微观层面的实施操作脱节,使国内外重大项目或行动积累系统性风险,不利于巩固省内存量基本盘和提升海外增量新动能,延缓了浙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进程。因此,为发挥政策引导保障支撑作用,最大程度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全省的全面发展动力,浙江亟需构建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的中观架构,支撑“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多元基础设施协同—反馈机制”一体化行动路径,以系统思维创新、理论方法创新和本地实践创新指引全省的开放工作。

高水平高能级开放的主要方向

在起步阶段,需要各层级地方政府、各领域职能部门或各行业大型国企的执行层分析、识别和聚焦多跨业务密集汇聚的前沿交叉领域,探索并建立先行试点,确立国内外两个主攻方向,以多元基础设施协同加速国内和海外各类海岛、山区、平原等地理、经济、文化迥异区域的融合进程。

主攻方向在巩固省内基本盘,即“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审视浙江省内现有重大项目或行动,已经具有较好的系统性和前瞻性。以“提升开放枢纽辐射全球作用”为例,浙江正系统构建“135X”整体格局,就是以宁波舟山港为枢纽牵引,提升杭州、金华、温州3大物流枢纽,拓展义乌、金丽温等5大通道,培育一批区域性特色节点。这种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的整体布局就是中观架构的具体化体现。在实施层

面,它以港航、轨交为主要途径疏通沿海—内陆节点城市、构建辐射世界的现代化交通物流网络,为建成全球或区域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地与新兴产业集聚地创造了前提条件。这种系统性、融合性布局为浙江沿海的石化、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以及自海向陆的沿途各类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往来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全要素流动提供了硬件基础。

主攻方向在提升海外增量新动能,即“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以“一带一路”沿线行动为例,展示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的中观架构对外行动的指引效用。浙江的金融投资、高端制造、轻工制造、信息通信、文化旅游等优势产业的产能、技术、人才、资本尝试跳出有限的浙江省市场,与国内或海外多元主体联合推动区域融合,提升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企业的本地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以降低国内或海外重大项目或行动的不确定性或系统性风险。此时,在重大项目群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等多阶段进程中,实现跨区域的轨道交通、港航、公卫等传统基础设施与跨区域的通信网络、数据中心、通用人工智能中心和无人驾驶或智能地面或低空交通系统等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跨区域的政务服务系统、数据合理流动与监管等制度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在对华友好、和平稳定且具发展潜力的全球目标市场促进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这种基于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的中观架构,不仅促进区域融合,还将指引沿线各地区的节点城市或重要城市群系统性应对包括公共卫生、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应急事件等多种全球治理挑战,建成可供全球参考的中国式现代化案例。

主攻方向在巩固省内基本盘,即“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审视浙江省内现有重大项目或行动,已经具有较好的系统性和前瞻性。以“提升开放枢纽辐射全球作用”为例,浙江正系统构建“135X”整体格局,就是以宁波舟山港为枢纽牵引,提升杭州、金华、温州3大物流枢纽,拓展义乌、金丽温等5大通道,培育一批区域性特色节点。这种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的整体布局就是中观架构的具体化体现。在实施层

对全国和全球高水平高能级开放的启示

这种基于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的中观架构,支撑了“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多元基础设施协同—反馈机制”一体化行动路径。这种系统性、融合性布局不仅有助于指引浙江省内的杭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城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或推动宁波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对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国内城市群或海外领先的都市圈、城市群协同发展而言,也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在全国尺度上,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的中观架构和一体化行动路径将有效落实省委省政府所提出的高水平、高能级开放的战略目标,为引导全省加快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实现开放红利与提振和扩大消费、重大项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等省内重大改革与创新实践相结合,实现全省高质量发展。

在全国尺度上,在大国博弈和技术竞争加剧之际,这种系统思维创新、理论方法创新和本地实践创新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保障我国和世界各国从地缘政治变革、地缘经济发展中收获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外交利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提供物质储备和精神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的中观架构及相应的一体化行动路径为全国的高质量改革、开放和创新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面、系统且可操作的实施指南。

【作者为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

观点万花筒

加快推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创新发展数字经济贸易”。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发文指出,数字贸易正在成为国际贸易发展新引擎,要加快推进数字贸易改革发展创新。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革命,加快传统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数字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大幅上升。由商务部牵头编制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2.7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5%。其中,数字产品贸易焕发新活力,数字内容制作质量和水平提升。数字服务贸易增势强劲,数字金融、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数字化交付的专业服务快速增长,服务外包加快数字化转型。

数字技术贸易国际竞争力增强,软件、云计算、卫星导航等服务出口保持高速增长。2024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到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高于同期外贸整体增速4.4个百分点。

王一鸣认为,展望未来,我国发展数字贸易具有诸多有利条件。数字经济规模巨大,拥有海量数据资源,数字基础设施完备,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移动宽带网络,加之数字应用场景丰富,为发展数字贸易提供了广阔空间。与此同时,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数字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还不足,数字贸易技术创新能力还不足,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有待提升。

王一鸣指出,面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加快构建的新形势,要坚持以高水平开放引领数字贸易创新发展,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推进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推进数字贸易合作“朋友圈”。积极参与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就电子支付、电信服务、ICT产品等议题达成共识。高水平履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电子商务规则,推进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国际互认,推进已签署的数字贸易条款按照高标准规则进一步升级。深化与东盟国家、中亚国家、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等数字贸易合作,加快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电子商务务实合作。

重要窗口 理论周刊·知行

人文经济学: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